

· 会议综述 ·

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第18届年会综述

2016年9月24—25日,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承办的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第18届年会在山东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辽宁大学、同济大学、吉林财经大学、浙江财经大学等科研机构的学者,以及《光明日报》《经济学动态》《山东大学学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媒体及出版单位的代表出席本届年会。

与会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新阶段与新任务,体现了经济发展新时期理论创新的紧迫性。黄泰岩教授认为邓小平倡导的围绕“姓资姓社”和“改革开放”展开的理论探讨,推进了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未来十到二十年的增长能否实现,就在于能否形成经济学理念上的创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确立新发展阶段的发展战略是经济学界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

一、关于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整体判断与具体特征

与会专家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中等收入陷阱”、“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新问题、新理论和新政策的提出,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具体特征。学界关于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热点议题主要围绕增长速度、结构调整、消费驱动、创新驱动和制度变迁等视角展开,与会学者也从这些方面分析了新阶段的具体特征。

刘国亮教授认为无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是总需求管理都是在增长的框架下展开的,现有理论集中在供求均衡点左侧的引导机制,未充分关注右侧的淘汰机制。在当前发展阶段政府的调控在左侧引导要素流向,在右侧进行事后淘汰过程中做好利益调节。张军果教授指出当前发展阶段上的经济新常态并非理想目标,而是我国经济在新的时期从低级向高级发展演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种特殊状态。速度放缓是表象,结构优化是内核,动力转换则是关键,制度变革是根本。

林善浪教授梳理城乡人口流动数据指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形成的劳动力供给从以前无限供给

转变为有限供给,是当前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李政分析了创新投入、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应辩证看待发达国家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比重偏高的现象,不能一味追高。苏立群将服务业划分为服务于物质生产的第一类服务业、服务于劳动力再生产的第二类服务业以及形成非生产性耗费的第三类服务业,并分析了依赖第三类服务业扩张的美国模式,依赖第一、三类服务业扩张的德国日本模式和依赖第一类服务业扩张的巴西模式。

臧旭恒教授认为在当前的收入阶段,化解中国居民的“低消费之谜”,应关注异质性消费者,即受当期消费影响更大的“非李嘉图消费者”。对我国居民消费的研究发现家庭流动性较高的资产占比的提升有助于提高家庭的平均消费倾向,增加居民消费应促进家庭资产构成的多样化,降低金融服务费率水平,提高资产整体的流动性水平。

杨蕙馨教授认为当前发展阶段应关注创新驱动下的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认为商业模式的创新具有重大影响。在当前发展阶段需要政府从细处着手,高度重视商业模式和产业模式的创新。魏建教授探讨了文化创意能力和人才激励制度,认为文化创意产业具有明显的个人专用性,需要较长时期的训练、思考与领悟,创意的专有资产具有较强的人身依附性。适应这一特点,非公司制的组织立法越来越重视“资合”与“人合”的融合。

卢新波教授分析了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所面临的改革的停滞与重启问题,认为问题倒逼改革是重要特征。为此,需要构建一个理论假说:实用主义政府具有资源控制能力和稳定性偏好,以财政压力指标影响改革动机,各级政府之间的上下互动机制构成行动路径,而经济增长顺利、财政压力降低会反过来迟滞改革。因此,当前阶段的改革会有限度的推进,应注意非市场化短期行为缓解改革压力的做法,使上下互动机制有效运行。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发展

道路的理论总结,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指导。研讨会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意义、指导地位、理论创新方向,以及如何推动其发展进行了讨论。

林木西教授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几次重要讲话指示精神,认为历次讲话分别指向各级党委政府、经济工作者、高校和经济学学者等社会各界,突出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求解决“三体系”不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动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三化”(某些领域马克思主义边缘化、通泛化、标签化)和“三失”(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中“失声”)的问题。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和重要任务。

学会创始人南开大学张仁德教授在大会发言中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首要创新。应明确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有制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明确市场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手段和形式而不能本末倒置使利润导向取代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应明确市场自发调节导致的周期与消极影响,防范教育、医疗等公共部门和思想文化领域市场化的潜在风险。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书记王立胜介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平台建设,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年度报告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动态》智库报告两个报告,经济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团队、智库合作团队和全国青年学者团队三个团队,以及《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中国经济史研究》和筹建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四个期刊。

学术评价标准是当前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贾根良教授从经济学多元化健康发展的角度指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良性发展,需要改进经济学科的学术评价标准。他介绍了各国经济学学生社团集体反对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一家独大”的学生运动,指出排斥非主流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引发的严重理论与实践问题。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应建立独立自主的学术评价体系。

三、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战略研究

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指导,

运用资本竞争、劳资关系、收入分配和再生产图式等政治经济学原理,与会学者探讨了新阶段的发展战略问题,提出的具体对策主要集中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

丁为民教授认为马克思论述的资本间竞争导致的生产资本过剩可以对当前的产能过剩提供恰当的解释,加强资本结构和竞争行为的调控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同时,劳资竞争与工资的变动也是影响发展质量的关键因素,美国的经验表明实际工资的提高有助于倒逼生产率提升、利润修复、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现代化进程。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以及我国结构调整缓慢可能与低工资水平下的“中低技术陷阱”有关。刘刚指出工资增长快于或慢于劳动生产率直接对应国内生产总值中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或下降,劳动收入份额与基尼系数呈明显负相关。

何自力教授认为供给侧宏观管理是一种结构性定向性宏观调控体制,具有直接性、强制性、精准性和长期性特点。供给侧宏观管理不同于西方供给主义经济学,也不是要实行计划经济,要坚持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并重,把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有机结合起来,推动结构调整优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

谢地教授提出辩证看待东北经济的下滑甚至负增长。当前下滑最严重的是重工业和资源产业等产能过剩领域。这是东北地区对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出的牺牲和贡献,这也为东北地区寻找经济发展新动能创造了条件。具体而言,应把东北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转型升级有机结合起来,高度重视民营经济的发展。黄铁苗教授认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应重点解决导致生产与生活浪费的体制性问题、无效投资与建筑物拆除导致的生产浪费严重问题、食品浪费与食品安全问题。在经济增长方面,存在工程质量差、产品质量差、服务质量差的问题,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应重点解决。

吕景春教授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城镇化问题上的关键是贯彻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其中关键是在供给侧找准着力点,落实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应吸取拉美等国过度城市化的教训,使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推进包容性城镇化,转变政府职能,由经营运行者转变为公共服务者,做到机会平等、共享、益贫、可持续。

(曲阜师范大学 刘刚 李亚男 李青)
(责任编辑:谭易)